

纵论从“文、质”论到“等值”论

包通法

(外语系)

摘要 追溯了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史,纵横论及了“文、质”论,“直译,意译”论以及“等值论”等的本质和历史意义,从而揭示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综合的新型学科的出现的历史根源和必然趋势。

关键词 “文、质”论;直译;意译;等值翻译

中图分类号 H159

关于翻译的手法,理论和评鉴标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就译事的手法、评鉴标准和理论探讨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持续了二千多年,从而使其在这种探讨中得到了发展和不断完善,使之发展成为一门综合的,系统的独立于其它学科的“翻译学”学科。

我国翻译历史渊源久远,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在古代的佛经翻译中,出现了许多翻译名家,并对译事理论作了精深的研究。早期的佛典翻译,多用“文”和“质”两字作为评鉴译文的标准。所谓“文”指的是“辞采”,即对译文加以修饰,使文章更为通达。所谓“质”指的是“朴质”,即严格依照原文,不增不减。与“文”和“质”相关的是“具”和“缺”,对原文加以删减的叫“缺”,而保持原文句量不变的称为“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翻译的衡量标准是属于“直译”和“意译”的范畴。我国古代翻译理论的争论焦点是“文”与“质”,即实际上属“直译”和“意译”之争。我国第一人明确提出翻译理论的是东晋的佛教大师道安(314~385),他是个“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论点是“……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文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译人之咎耳!”^[1]意思是说,凡是把佛典译成汉语,都是由于不懂原文的语言而又渴望了解它的内容;在翻译时,要把原经文意思说清楚了,不可遗漏,而文词质朴一些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凡是未按他的“直译”主张译出的经文,道安一概斥为“掺了水的葡萄酒”。他在《比丘大戒》译本序中就曾经这样论述过:“译者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或殊失旨,或举相意。……意常恨之。……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揽焉。诸出秦言,

收稿日期:1995 01-10

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2]根据他自己的翻译佛经的实践经验,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直译的翻译理论。隋代的名僧彦琮(557~610)是极推崇道安所代表的“直译”派观点的。他在《辨正论》中,开宗明义,主张直译,谓曰:“若令梵师独断,其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意看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皆源^[3]。”并从而提出了“八备”,“十条”的翻译观。彦琮从学问与道德修养两大方面给译者提出了全面而又严格的要求,实际是道安的“三不易”之说的继续和延伸。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佛典翻译的实践中,道安以后的许多翻译家都深切地感到完全采取“直译”是行不通的。因此,佛典翻译,则出现了“质”趋“文”的必然趋势,即轻“直译”而重“意译”。苻秦时代的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就是意译派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鸠摩罗什,苻秦僧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他与弟子共译出《小品般若经》等经书约35部294卷^[4]。鸠摩罗什在论及佛典的翻译时持有这样的观点:“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官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贡德;见佛之仪,以歌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清失味,乃令呕秽^[5]。”鸠摩罗什在译经中力求典丽,不流于生硬,因而他的佛经译本文辞优美,对其中有些原文大加删削,甚至改变了原文结构,作了一番加工修饰,故其译本被称之为“新译”。他还对“轻文重质”的干巴巴的译风极为反感,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意但失文体之美。唐代玄奘(602~664)在罗什译经的基础上更是成就卓著,取得了重大突破。玄奘也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他从贞观19年开始译经,20年间,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玄奘还将《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译文质量之高,超过前人。玄奘是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译经高僧。尽管他的有关翻译理论方面的论著迄今未有发现,但从其弟子的记录或一些古籍中可以了解他对翻译的看法。《翻译名义集》中的《梵语序》记载了玄奘的“五不翻”之说——一即一,“秘密故,如陀罗尼”。(因佛教内部为了适应本身的特殊需要而使用了一些密语的缘故,翻译时不可“意译”,须“音译”,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一词含多义,不可“意译”,只可“音译”。如“薄伽”,梵文中含有六种含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由于中国不存在某种相应概念的缘故,而只可“音译”,如佛典中提到的“阎浮树”,是一乔木,为印度特产,中土没有。);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一词,自东汉迦叶摩腾译经以来已约定俗成。);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浮。”(从考虑译文的效果出发,有的词语须“音译”,如般若”一词,译成“智慧”不免有些轻浅淡译之感。)由此可见,玄奘对前人的翻译理论除继承了“意译”派的观点外,又吸取了“直译”派的某些观点,兼顾中外两种文体语言的特点,融“直译”与“意译”于一体,继承和发展了鸠摩罗什“意译派”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精严凝重的独特风格。

在两方翻译史中,翻译理论中有关“直译”与“意译”的论战从古至今,双方也是各抒己见,论战不休。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公元前106~43)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就这样说过: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词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西塞罗是从修辞学家、演说家这二角度谈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即“直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的翻译——即“意译”。这样,西塞罗第一个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确定了翻译中的两种基本方法:“直译”与“意译”。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一直围绕着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否,精确与不精确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论战。在古代,贺拉

斯(公元前 65~8)认为“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直译”^[6],而会采用活译的手法,主张“意译”;而中世纪的罗马波依休斯(480~524)则主张宁要“内容精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观点;但英国阿尔弗雷德国王(849~899)却推崇“有时逐字译,有时意译,力求译文清楚易懂”的灵活处理的兼并“直、意译”的翻译观。在 17~19 世纪,法国的德阿伯兰特主张翻译成文学性,可谈性的“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手法,而巴托(1713~1780)则强调“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说法,提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精确翻译论;但英国德莱顿(1631~1700)却提出了“直译”,“意译”,“拟作”的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而德国的歌德(1749~1832)认为“朴素无饰的翻译总是最适当的翻译”云云。论战的焦点仍是“直译”与“意译”。

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学贯中西的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翻译三标准之说,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翻译须遵循的原则和评鉴译作的标准。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译例言》里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表面上说译事难事,实际上是指译文需达到的标准。对于“雅说”,尔后的翻译大家观点各异,有赞同的,有不甚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尤其是本世纪 30 年代,围绕“直译”和“意译”这两种翻译手法,诸家百说各执一词,各不相让。这场论战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我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介绍和翻译了不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文化、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些译作采取了“直译”手法吸收了一些外文的词汇和语法,融入祖国的语言,丰富了汉语。鲁迅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直译派”的代表。因此,围绕“求顺而不忠”,“求忠而毋宁不顺”的两种翻译手法——即“直译”与“意译”在 30 年代的翻译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30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大晚报》的副刊《火炬》上发表了《钱基博论鲁迅》一文,说“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诘屈聱牙,过于周诘,学士费解,何论民众?”更早一点,在当年《新月》第一卷 6,7 号合刊中,刊登了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说“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读起来比谈天书还难,“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因而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针对这种“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种轻率的翻译观点,鲁迅先生反讥为“乱译万岁”,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1930 年)一文中说:“我的译作《若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鲁迅先生还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

而金岳霖先生以他哲学家的头脑在他《知识论》中提出了“译意”与“译味”的翻译观:“翻译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译意,一种是译味。”他从哲学的高度分出了两者在含量上呈反比关系,即意念上的意义越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少,意念上意义愈不清楚,情感上的寄托愈容易丰富。说白了还是“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关系。

随着西方语言学的发展,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开始把语言学研究上的新成果运用于翻译理论的研究。50~60 年代,英国的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把翻译定义为:“一种语言(原语)的篇章材料被与其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目的语)的篇章材料所替换[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s:“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70 年代末,奈达根据自己的翻译《圣经》的亲身体会认识到:绝对的翻译等值是不可能的,卡特福德的定义有些过于武断,于是将定义修改为:“翻译是指接受语复制原语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首先是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

面。”(Translating consists in 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等值翻译论”者他们从符号学和信息论入手,对翻译实践进行探讨。奈达提出了静态等值和动态等值,将语篇切分为单词,词组,句子,句群,篇章等不同的层次,探索求得对应层次最大等值,同时又阐述了词汇语义与词汇用意义的相互关系,从而求得“最近似的自然等值”的翻译评判原则。e. g

English	Chinese	Illustrative example
old	旧	旧衣服
	老	老人
tough	老	牛排老了
	硬	硬仗
hard	硬	硬座
	难	难题
disagreeable	难	难吃

到了80年代,纽马克将语法规则,文体论,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并根据源语意义结构的区别和交际目的的差异创立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方法,以求得某些场合下求得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描述等值(descriptive equivalent),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t)或文化等值(cultural equivalent),把对译文质量的评鉴从结构转化为信息的量化衡量,从而使某些含混不清的“直译”和“意译”问题变得明朗清楚得多。如短语 to love with the heart,这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心是情感中心”的文化背景。为求得文化等值:在不同的语言文化时应分别译作:

西非语言: to love with the liver

马雅语言: to love with the stomach

马绍尔群岛语: to love with the throat.

正因为如此,纽马克自己曾经这样说过:“For this reason,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like the term ‘unit of translation’, is... a useful operational concept.”(正因为这个原因,翻译的等值,如同‘翻译单位’这个术语一样,成了……一个有用的,可操作的概念^[7]。)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翻译理论界加强了与国外同仁的交流和接触,把“他山之石”介绍引进到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无疑对我国翻译理论界是一股新鲜空气,因而“直、意译”之争又引进了“等值翻译论”。“绝对等值论”与“近似等值论”之争在逐步取代了“直、意译”之争。然而,不管是“等值翻译论”者也好,还是“直译”“意译”论者也好,他们都仅仅是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探讨翻译这门科学,他们的视野都仅限于语言学的范畴。“直译”、“意译”论者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篇章,结构和词义上;而“等值论”者则着眼于信息和符号二者上,把对译文的评鉴标准进行了量化处理。故仍属于“直译”、“意译”的范畴,是一种微观的评鉴方法论,可以说也是我们处理译出语与译入语的一种方法,手段与技巧,对于具体的翻译实践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然而,笔者认为,评鉴一翻译作品不可只从微观考虑。翻译首先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尤其是在翻译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如译诗,“形美”、“意美”、“音美”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复先生的“信,

达,雅”三标准是一种从宏观上对译文的评签标准。对于这个标准,我们不能只作狭义的理解。对“雅”说,当然在严复先生时代,是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仅拘据于严复先生的原始意义,应赋予其新的丰富的内涵。许多当代翻译大家都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说:许渊冲先生语:“科学研究的是真,艺术追求的是美^[8]。”黄龙先生语:“译出其文,译出其人,译出其情”,翻译“总须肥瘦得宜”“或唱下里巴人,或歌阳春白雪,均需雅俗共赏,各领风骚。”傅雷先生提出翻译要“神似”,钱钟书先生提出翻译要“化境”云云,都是对严复先生“雅说”的最好注脚、补充或完善。随着诸家百说的争鸣,翻译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目前,中外翻译理论家都有了一致的共识:翻译有其自己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手法,技巧,而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光一个“直译”,“意译”,“神韵”,“化境”,“等值”之说是远远不够的。它是一门综合的,多学科的系统科学。在1988年,我国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作者是黄龙)出版了,这标志着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它必将给翻译事业带来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

参 考 文 献

- 1 转婆沙经序
- 2 出三藏集记. 卷十二
- 3 续高僧传·彦琮传
- 4 出三藏记集
- 5 高僧传. 卷二 鸠摩罗什传
- 6 翻译通讯. 1985.7
- 7 Newmark, About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1:33
- 8 许渊冲.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材.
- 9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85, 3

Scanning From Theory of Modification Translation VS Faithfulness Translation to Theory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Bao Tongfa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cans the essenti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odification Translation vs Faithfulness Translation",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vs Fre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By means of it, this paper discloses the historical reasons-and-causes and unavoidable tendency that "Transtology" grows out of other disciplines and develops into a comprehensive and new discipline.

Subject-words Modification translation vs faithfulness translation theory;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quivalence